

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 有用于世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可以有用于世的学科。这门学科能够见重于当世，就是由于它具有有用于世的作用。它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人们是能够利用自然，并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正是由于能够利用自然，并进一步改造自然，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达到更高水平。当人们还在旧石器时期，只能说是尝到自然的恩赐，还谈不上利用自然。能够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是由新石器时期才开始的。当时的人们观察和探索后世所称道的粮食作物的生长繁殖，以之维持生计，这就是利用自然。经过观察和探索，发现这些粮食作物还可以按人们的需求从事播种，因而就开垦土地，种植收获，这就不仅是利用自然，而是进一步改造自然了。这样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当然不以粮食作物为限，而是涉及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是时时在变化之中，这样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就是随着自然的变化而不断有了新的内容和规模。

这样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应该说还是自发的，是依靠着长期的经验的不断升高才能得到的。这当然能够获得成就，显示出进步。经验固然值得珍贵，所需要的时期也许是相当长久。如

何由自发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转变而成为自觉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使之更符合要求，这应是人们长期以来所希冀的事情。自发是人们未能认识并且未能掌握客观规律时的活动，自觉则是人们认识且能掌握一定的客观规律时的活动，两者迥不相同。人们不是满足于自发活动，而是期望能够有更多的自觉活动。

远在古代时，许多学人都为此而努力钻研，各自希冀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方面也从不后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现在的名称，远在距今两千年前后，已经有不少学人在这方面致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以前称为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学肇始于东汉的班固。追溯它的基础，还可上推到战国时期托名大禹的人所撰写的《尚书·禹贡篇》。《禹贡篇》的内容极为丰富，举凡疆域轮廓、政治区划、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兼收并蓄。其中有些记载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可是有关于交通的叙述就不是如此。当时称雄的诸侯并立，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各国各自有其交通的道路。《禹贡篇》所叙述的却是整个华夏的交通网。当时如果真的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有关交通的道路也不过如是而已。班固所撰的《地理志》虽说只是《汉书》中的一卷，却是《禹贡篇》之后的大著作。《隋书·经籍志》对它颇为称道。《隋书·经籍志》说：“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这应是当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结果，也为以后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奠定了基础。这两部著作显然都是有用于世的。它们的撰著者都应该说是这门学科的开山之祖。可见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已有用于世。历代相沿，此风不替。

中国历史地理学有两个组成部分，就是历史自然地理和历

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之下又各有若干分支。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益于世的学科，这两大部分也应该是各得其所，无分难易。这里先由历史自然地理说起。历史自然地理包括地形、水文、海洋、土壤、沙漠、气候、植被等方面。这些年来大致没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增添的话，可能再添上动物地理。自然因素是经常在演变之中，它有一定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当然有助于当前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这里不妨略举一些例证，作为说明。并依次由历史自然地理所包括的各方面逐一论述。

我国幅员广大，各处地形皆各具特色，难得一致。位于黄河中游，北起阴山之下，南迄秦岭北麓，则是黄土高原。远在上古之时，这里分布着为数不多而平衍广阔的大原，可以说是沃野千里，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可是由于土壤遭受侵蚀，到现在原来那些大原都已支离破碎，加上沟壑纵横，难得再有较多的平原旷野，也难得作更好的利用。不仅农业未能稍有起色，就是交通也更为困难。如何改造，使之恢复昔年的旧观，这是许多学人苦思冥想，不易解决的问题。研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者，是不会置身事外，不加闻问的。

在我国广大的版图中，既有名山，也有大川，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实孕育了我国的文化，并促其不断发扬光大。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泥沙混杂，倾泻而下。至于下游平原，流速减低，所挟带的泥沙，逐渐沉积，遂使河床抬高，高于岸侧陆地，因而时有溃决泛滥。数千年来，迄未永庆安澜，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殆难核计。如何减少泥沙，降低下游河床高度，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禹贡篇》记大禹的治水 着重导河。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亦皆以黄河为重，后来作者延续不辍，河患却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也应该是研治中国历史地理

学的学者再接再厉的事功。

我国大川巨流既如此众多，咸奔流入海，故海岸线亦相当绵长。海岸线和其他自然现象相若，也是在不时演变之中。古人曾经以沧海桑田形容世事的变幻。这样的形容并非了无依据，沿海一些地方就曾经屡见不鲜。渤海湾头，淮河和长江入海口的南北皆可作为证明。就是现在的黄河入海还在一直不断向前伸展。当前正大力开发黄河三角洲，就是在这样伸展之处施展鸿图。现在我国正在发展海洋航运，自须在沿海各地建设港口，若不仔细探索其间的自然变化，也许所筑港口就难于应用。研究其间演变的历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土壤方面。我国地大物博，就是土壤也难得各地都能相同。《禹贡篇》论当时的天下，以之分为九州。九州就各有其土壤。而雍州的黄壤居于上上等，扬州的涂泥则列为下下。雍州为现在的陕西、甘肃诸省地，扬州则为淮水中下游以南以迄东海各处。《禹贡篇》对于各州的土壤只是就其显著的差别言之，当然不可能像现代学人对于土壤研究的深刻。但雍州和扬州之间的差别是显然的，也是巨大的。扬州涂泥自是水乡泽国的景色。就是到现在也还不妨称之为涂泥，不过其等第早已不是下下，而应该是上上的了。雍州的黄壤到现在可能有些变化，也许是现代的学者作出更为周详的类别。不过《禹贡篇》以之列为上上等，应该不是率尔说出的。现在陕西、甘肃两省的土壤在全国的等第已经难于以《禹贡篇》所说的来衡量，如何使之发挥原来应有的效力，这是应该三思的。

说到土壤就不能不稍稍涉及到沙漠。沙漠之地自然就说不上土壤。不仅没有土壤，沙漠的扩大还使其近旁的土壤受到掩覆、沙化的问题因而也就严重起来。这样的现象在以前的年代里

就已经不断发现过，现在就更为显著。由现在的西安，也就是汉唐诸代都城的长安，通往西域的道路，现在艳称为丝绸之路，天山以南的一些段落，就曾为沙流所覆盖，而限于行走，甚至无由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高原，也由于当地沙漠的扩大，耕牧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就是陕西北部榆林、横山等县也都受到威胁。沙漠不是我国所独有的现象，并世各国也往往有之。如能探索钻研，治理好沙漠，则受益者当不仅我国的一些省区，其他为沙漠所苦的各国也将实利赖之。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自然地理部分列入了气候，这是不可少的。气候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地面的动植物的生存和分布，也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和居住地区。古往今来的气候变化是相当频繁的。千余年前，黄河中下游，到处可见梅树。梅花作为观赏植物，频见于文人学士的吟咏撰述之中。可是后来黄河中下游梅树竟已不能再行栽种。远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往往发现杂有亚热带的禽类骨骼，就在文献记载中，也可看到远古之时黄河流域的人们对于象并不感到生疏。可是这样的兽类到后来都已绝迹，不复再见于黄河流域。这些动植物分布的变化都是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当前研究历史时期气候的学者正应该投身其中，共同致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旱涝的变化，这是与农业生产最有关系的现象。尤其是雨涝过甚，还会促成江河湖泊的泛滥溃决，为害更为严重。当前我国百业俱兴，农业的重要性并未稍事减低。能探索出这方面变化的规律，对于国计民生能说没有效益？

当前引人注意的问题，森林的破坏，植被的摧毁也是其中显著的一宗。我国植被本来就很丰富，由于遭受到长时期人为的破坏，一些林木葱茏的峰峦，就都成了濯濯的童山。不仅材木无由

取给，而且降水也难得受到涵蓄。材木不能取给，关系还不至于过大，降水未能得到涵蓄，贻患却是无穷。一遇久雨、大雨、暴雨，土壤就难免受到侵蚀，有关河流也往往泛滥成灾。甚至有的森林由于遭受破坏已经多历年所，一般人已难得忆及，遂谓其地本无森林，并推衍其地之所以无森林，乃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即使重新培植，也难于得到成效。这是显然与实际不相符合的说法。经过有关学人的论证，并提出具体的资料，证明一些地区的森林必须恢复，一些本来宜林而被误认为不能培育森林的地区更应该多加注意。近年来培育森林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的成就，这固然是从事林业者的努力，一些有关的呼吁和论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三北防护林中的许多林段，以前被认为是不宜造林的地方，如今也都郁郁葱葱，实为可喜的现象。当然，和植被有关的问题仍有许多须继续研究，是不容稍事疏忽的。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动物分布地区变迁的研究也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前面已经提到，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就曾经有过亚热带的兽类。这些兽类的骨骼在那时的文化遗址中曾经不是一次的发现，可以证明其分布的广泛。而一些古文献中也有象的记载，当非出于偶然，为什么古往今来有这样巨大的变化，是值得钻研的。当前国家已颁布命令，对于一些珍稀的鸟兽虫鱼进行保护。其中较为显著的有朱鹮、熊猫、东北虎、鳄鱼等。保护自是限制捕杀，更重要的是增加繁殖，探索其分布地区的变迁，使它们的繁殖当更为方便。

这里所说的只是就历史自然地理所包括的诸方面各举出一些例证，以说明这些方面都可有益于世。这样的例证还可举出很多。实际上，上述诸方面的内涵都是相当丰富和广阔的。应该说都能为世所用，是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治者好自为之。

论述历史自然地理既竟，当继续论述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所包括的诸方面，都能和当前的国家经济建设相互联系，因而也就能易于为世所用。历史人文地理就不免稍逊一筹。因此不免有人会说，若要讲到为世所用，历史人文地理恐怕不如历史自然地理易于见效。其实并不尽然。前面曾经提到班固所撰述的《汉书·地理志》，历史证明，这是一篇有益于世的巨著。它之所以为世所用，《隋书·经籍志》已经作出详细说明，用不着再多赘一辞。应该说，班固在这篇巨著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讲人文地理。这就足以证明历史人文地理是能够有益于世的。

这里还可以举出禹贡学会的成立作为例证。说起禹贡学会，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都不陌生。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说它年轻是因为建国以后在旧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因素。这其中的转折点就在禹贡学会。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个名称也是禹贡学会才开始应用的。禹贡学会创立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顾颉刚先生发起创立的。顾颉刚先生是当代的历史学名家，但他所发起创立的禹贡学会却不是在发思古的幽情，而是慨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国国势的不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攫夺我国的东北三省，更伸其魔爪于长城之内，平津各处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顾颉刚先生为了向举国人士昭示我国的大好河山，不应使侵略者妄图改变它的颜色，因而创立这个学会，并发行《禹贡半月刊》，期望在这方面多所致力。正是因为顾颉刚先生创立了这个学会，就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抗日分子，在它占据北平以后，拘捕名单上就列有他的名字。可见禹贡学会在使这门学科发挥出它的有益于世的作用，作出了显著成就。在那种艰辛险阻的环境

中，顾颉刚先生奋不顾身，坚韧不拔，临危见义的精神，就是现在道及，依然令人景仰。当时这门学科虽已有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名称，实际上还未完全摆脱沿革地理学的旧规，可见沿革地理学能够得到恰当的处理，同样是可以有用于世的。在以前的许多年代中，沿革地理学未能发挥出有用于世的作用，只能说，那时的学人“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沿革地理学一向是史学的附庸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和以前有所不同。顾颉刚先生只是历史学名家，并非自然科学家，就是这样，他使历史地理学的历史人文地理部分发挥出这门学科的有用于世的作用。

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一样，同样也包括了许多方面。建国之初，它大致还仅限于经济、政治、人口等较少的方面，后来逐渐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有所增多。究竟增加多少，当前学者间见仁见智，容或间有不同。不佞以为应该包括民族、人口、政治、经济、聚落和城市、军事、文化等方面。为什么要包括这些方面？这在拙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一书的序文中曾作过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也许还有什么可以增添的，或者某一方面还可再作分析，那是以后的事。可能的同志对于这样的分法有意见，当然可以再行讨论。这里提出的这些方面，都可以分别显示出这门学科有用于世的作用。

首先是历史民族地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都各有其活动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各民族活动的地区就不免有所移动和变迁。说清楚这些移动和变迁的过程和确定其具体的所在，是会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当前有些国家的别有用心统治者，利用达赖喇嘛，簧言惑众，拨弄是非，妄图使西藏自治区脱离我国版图。这是举国上下都难以

容忍的侵略企图。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有责任，对此作出详尽的剖断，揭露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诡计。百余年来残酷经历，中国人民当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伎俩。在他们的众多伎俩中，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就是一支重要的毒矢，因而研治历史民族地理应该不是了无意义的。

我国不仅民族众多，人口也更为众多。这众多的人口是当前并世各国皆无由比拟的。人口众多，各地不是平均分布的。有稠密的地区，也有稀疏的地区，还应该说是重心所在。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而是自古已然。这当然会影响到生产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在以前就曾经有过宽乡和狭乡的分别，对有关地区土地的开垦就起到不同的作用。其影响也还不少。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以前的时代里都曾经寻求过解决的办法，其间有得有失，各不相同。有的仍可以作为今天的参考。这是一个并非单纯的课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是可以从容胜任的。

历史政治地理是从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蜕化演变出来的，但并非完全同于以前的沿革地理学。如前所说，沿革地理学也一样可以为世所用，顾颉刚先生所首创的禹贡学会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但是无庸讳言，以前研治沿革地理学的学者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这样的作用。烦琐的考据使它受到若干制约。考据是治学的一项基本功夫。马克思主义对于考据也是相当重视的。但考据只能是治学的一种手段，而不应该当作治学的目的。把方法当作目的，必然会使沿革地理学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为世所用的作用。顾颉刚先生的确是精于考据的。巍然为当代名家。但他只是把考据作为治学的手段，而不以之作为目的，因而他能够引导沿革地理学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顾颉刚先生如果不以考

据为手段，恐怕不易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当前我国的行政区划是分省而治。省的制度有其悠久的渊源，就是省的区划也有很多地方还是沿续以前各代的旧规，而无所改变。这样一些旧规是否能符合当前的形势？不能不使人置疑，最近几十年来不断有人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甚至还提出改革的建议。当然这是国家的大政，不是率尔所能论定的。虽说如此，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还可从容研治，以待征询。

自来经济都是基础，历史经济地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也不是等闲的篇章。经济地区和经济都会也和其他人文地理的景观一样，都是因时而有变化。远在上古时期，黄河中下游之间，再加上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和山东北部的济水流域，实为富庶的经济地区。可是后来这样的富庶经济地区，却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周围的富庶经济地区自形成以来，迄今已逾千载，今后能否一直固定下去，是一个值得研治的问题。就是经济都会也是如此。远在春秋战国之际，相当于现在山东定陶县的陶就以位于“天下之中”而闻名遐尔，成为当时唯一的经济都会。后来相当于现在江苏扬州市的扬州继起，其富庶的程度远超过了当年的陶。唐宋时期人士称道扬州，“扬一益二”一时成了口头禅。这是说全国的经济都会只有相当于现在四川成都市的益州堪和扬州相比拟，然亦不能越过扬州，只好屈居第二。再后来，上海又代替了扬州。上海之后又将如何？也是一宗耐人寻味的问题。

当前全国建设普遍开展，盛况空前。城市建设也是到处兴工。我国疆土广阔，城市繁多。有的城市历史悠久。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中如何保存原有的遗迹，如何创建新的市容，确实值得注意。原有的遗迹不仅为文化的结晶，也是当前吸引旅游

者的标的。保存这样的遗迹固然有其必要的意义，但不能因此而过分影响新的市容的规划。近来中国历史地理的研治者在这方面多所致力。北京城的扩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都曾有过相当的贡献。全国城市如此繁多，正需要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作出更多更新的成就。

比较不易着笔的是历史军事地理。古今军事的变化最为频繁，历史军事地理也就相应复杂。尤其是晚近新发明的武器日益增多，对于战术战略都会有所影响，作为战地的条件当然也会因之而前后异趣。以前不佞曾被陕西省军区借调去撰写《陕西历史军事地理》一书（不佞所撰写的部分收在拙著《河山集》四集中）。这是由现已去世的皮定钧将军在当时安排撰写的。历史上的军事当然和现在不同。那时只有步兵、骑兵，更早的则是使用车战。这些都是陆军。再加上水师。而现在陆、海两军之外，还有空军，甚至还有其他的兵种。皮定钧将军对这样的差别作了说明。他说，战争的结果主要是胜利者一方的占领土地。即令是在战争初起时，敌方已经投降，为了控制，还有必要去占领土地。不论兵种如何，说到最后，还是离不开土地，也就是说须要注意地理形势。当然，研究军事地理，和现代战争中的兵种无关。就是和现代战争联系起来，地形还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治中，历史军事地理的研治成果显然较其他方面为稀少，几乎和研治历史动物地理相仿佛。近年来对于历史上某些著名战地的研究仿佛成了风气，其实这只是一些地方因为想把有名的战地列入自己所在的地区，以增加当地的知名度，为当地添上一些风采，不能以之作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治。有关这一方面的研治工作还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努力。

我国以有悠久历史而为并世各国所推崇。历史悠久，文化也

就相应发达。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地理也是不断有所变化的。秦汉时人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所谓关东、关西是以函谷关来区分的。函谷关的遗址在今河南灵宝县弘农河畔。关东、关西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也就有了差异。关西接近当时的匈奴。匈奴经常向南骚扰侵略，关西的人就得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关西是产马的地区，有了马匹就更容易从事修习战备。因而就涌现出好些良将。关东经济发达，又多儒雅之士，得以修习六经，从容论道，其中从政之人就可以跻身相位。关东、关西都在黄河流域。所谓中原之地就在黄河流域。当时中原人物之盛，是其他各地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可是曾几何时，中原人物就显得凋零而东南长江下游和太湖周围的人物却逐渐显露头角，并进而超出于中原之上。当然，东南长江下游和太湖周围仍应继续不断向前发展，中原各处也应有所致力，使它再显现以前的盛况。就人物的出处来说，就已如此。历史文化地理的研治并非只限于人物的出处，自应各方面都能有所开拓。我国是文明古国，我们不能仅仅空具思古的幽情，而应该使文明古国不断发展，这应该是研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共同的心愿和抱负。

上面所论述的，只是就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各自包括的一些方面略作说明，以显示它是可以为世所用的。这里所列举的只能是个别的例证。当然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很的，也是很普遍的。这里就难得详细说得出来，只好由研治这门学科的学者自己忖度了。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过应该感到，只要不作“是不为也”的设想，则发挥这门学科的为世所用的作用，应该是“非不能也”。

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如前所说，是有悠久的渊源的。

建国之后，虽然由于在旧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因素，而被称为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但它确已成为显学。能够成为显学，它能够被世所用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作为一门学科，是应该为世所用的。如果不能为世所用，就难得存在下去。自来有些学问被称为绝学。绝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宏伟独到的学问，一种是失传的学问。宏伟独到的学问当然应该继续发扬，使之更显得光辉。至于失传的学问，失传的原因可能不一，其中一条应该是不为世所用。既然不为世所用，失传了也不会使人感到可惜。可以想见，为世所用是一门学科能否长期存在并且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门为世所用的学科，问题是如何发扬光大，使它更易为世所用，使它更能发挥出为世所用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全国上下皆在努力建设，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日新月异，节节升高，确是难得的盛世。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恭逢盛世，对当前的建设添砖加瓦，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应该使它发挥出更多更大的作用，永葆青春，永盛不衰！

1992年5月24月到28日，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西安联合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在西安联合召开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北京、上海以及许多省区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皆不辞辛劳，远道莅临，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在会上我作了以《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为题的发言，承与会的同志们谬加赞许，嘱为写定。会后因就发言稿再作整理，撰成是篇，期望能有助于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当世方家幸有教之。

1992年6月5日，念海谨志

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

一 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主要河流

黄土高原有巍峨的高山和广漠的原野，山原之间还有纵横的河流。这些河流主要有渭水、汾水，还有沁水。黄河贯穿黄土高原，渭水、汾水和沁水都是黄河的主要支流。另外还有一些河流由太行山西向东流去，分别是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水，这些河流以前本来也是黄河的支流，后来黄河改道了，就都成为海河的支流。

二 这几条主要河流本来流量的探溯

这几条主要河流，从远古时期起，流量都应该是相当巨大的，它们的中下游河段也都是可以通航。根据文献记载，其通航航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三千以前。

这里就先由渭水说起。渭水下游本是周人肇兴之地。当周人远祖公刘始居于豳时，就已经在渭水行船。《诗·大雅·公刘》说：“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这是说，公刘在豳，盖起房屋，安置好民众，又派人到渭水之南去取砺石和锻具。既然要越过渭水，看来一定利用了船只，不过上下水的行程

也许不是很远的。

渭水更远的航运行程，在春秋时期就已见于记载。当时渭水下游是秦国的土地，隔着黄河，汾水下游却是晋国的土地。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 647 年）晋国遭遇了荒年，秦国为了帮助晋国，就运粮食救济。秦国都城在雍。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南就是现在渭水岸旁的宝鸡市。晋国都于绛，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南，靠着浍水。浍水为汾水的支流。秦国救济晋国的粮食，就是靠船只来运输的。运输航道是从现在宝鸡市起顺渭水而下，进入黄河，再溯黄河而上，进入汾水，由汾水到了浍水。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称为泛舟之役。可见渭水的航道是相当长的，汾水的航道亦不很短。

经过战国时期到了秦汉两代，相继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王朝。秦国都于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汉朝都于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秦汉都城都濒于渭水，隔河可以相望。都城所在地一般来说人口都是相当众多的。关中平原虽很富庶，却还解决不了都城的人口粮食不足的问题。秦汉两个王朝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努力发展关中的农业，提高产量；同时又都由关东各地运输漕粮，以相接济。漕粮是通过水道运输的。运输的水程都是先运到黄河岸旁，再由黄河而上，进入渭水，运到咸阳^①和长安。咸阳和长安以西的航道是否还可以通航，没有见于记载。秦汉时期在长安城北渭水上修筑桥梁。^③桥梁中间未见高起桥面，大致和两

《史记》卷 97《郿食其传》：“郿生（说汉王）曰：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正义》：“秦始皇时置仓于敖山上，故名之曰敖仓也。”正由于敖仓储粟很多，汉王即以之为据点，与项羽相抗衡。敖仓之粟自是由黄河西运至咸阳的。

《史记》卷 29《河渠书》：“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所谓“异时”，盖自汉初即已如此。

《水经·渭水注》。

岸的道路平齐，不像后来南方的宝带桥，下边就不可能行船。

由于漕粮都是从东方运来的，所以长安以西不是通漕道路。因而有关航运的记载就难得详瞻。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通航的。撰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所记载的梁州贡道，就是由潜水越过巴山进入汉水，再越过秦岭进入渭水。当时越过秦岭的道路，主要是所谓“陈仓道”^②，是因为它的北口在陈仓而得名的。当时的陈仓在现在的宝鸡市稍东些，也就是说比泛舟之役的起点还在上一点。

后来由于王朝有了变化，都城有一段时间不在长安，所谓漕运就无人提起。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长安才又长期成了都城。这时为了供应都城的粮食，也和秦汉时期一样，由关东运输漕粮，由黄河进入渭水。当时长安城东北有一座东渭桥（在今西安市耿镇东南），就是由渭水上运的漕运终点。那时东渭桥帆樯林立，俨然是一座货运的码头。

长安以东这一段渭水，由于河道弯弯曲曲，船只往来颇为费时。西汉时曾由长安城下起傍着渭水南边开凿一段漕渠，向东通到黄河里。^④隋唐时期也和秦汉一样，在渭水以南开凿一段漕渠。^⑤但隋唐时开凿的原因和秦汉时不完全相同。秦汉时开凿漕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 1《京兆府》：“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本名横桥。架渭水上。始皇都咸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刘裕入关又毁之。”刘裕西征，王镇恶率水军自河入渭，直抵长安城北门外，见《宋书》卷 45《王镇恶传》。横桥仅出水面之上，桥下不能行船，故镇恶毁之，以利行军《元和郡县图志》所说是也。

《史记》卷 8《高祖记》又卷 92《淮阴侯传》。

《全唐诗》卷 587 李频《东渭桥晚眺》：“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

《史记》卷 29《河渠书》

⑤ 《新唐书》卷 53《食货志》

渠，只是由于河道下游弯曲，想借此缩短航道的路程。^①隋唐时却是因流浅沙深，不利于航运。^②这显示出渭水流量已逐渐减弱。长安以西这时没有航行的记载，不过却另有一些有关运输木材的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所用的木材，有些就是由渭水中游运来的。还在唐代前期，曾经开凿过一条升原渠来运输。升原渠由现在千水下游起通到咸阳。^③这样的运输可能不是利用船只而是扎成木筏顺流而下。因为千水只是渭水的一条支流，流量当然比渭水更小。后来由于千水的流量不足，才由千水入渭水处起，引用渭水入渠来运输。^④唐朝以后，宋朝以开封为都。建都所用的木材，大量是由现在甘肃天水市以下洛门等处运来的。^⑤当时运输材木就是由此扎成木筏顺流而下的。^⑥当时运输材木，中途多有困难，因为水运途中，遇到湍险处经常会遭受漂失。^⑦木筏还会遭受漂失，可见船只航行是不容易的。不过这是就长安以西的水道而言，长安以东还不能一概而论。这时长安既不再为都，东边的漕粮当然就不再西运，反而陕西的粮食还要向东运输，供应新都开封。^⑧当时长安为永兴军路的首府。向东运输就是由长安附近运起，这说明渭水还有航运的力量，不过航运船只是大为减少了。宋以后不再听说航运的事了。

再说汾水。如上所说，两千多年前，秦晋泛舟之役是从秦国

《史记》卷 29《河渠书》。

《隋书》卷 24《食货志》。

《新唐书》卷 37《地理志》：“凤翔府虢县西北有升原渠，引汧水入咸阳，运岐陇水入京城”岐陇水运到京城有何用处？这里所说的岐陇水当系岐陇木之误。

宋敏求《长安志》卷 14《兴平》

⑤ 《宋史》卷 266《温仲舒传》

⑥ 《宋史》第 257《王仁瞻传》。

⑦ 《宋史》卷 299《李仕衡传》

⑧ 《宋史》卷 175《食货志上三》。